

親緣、實力與代價： 台海穩定的現實主義新框架

殷彤

美國奧本大學 博士 洞見橋商業諮詢公司創始人

進入 2026 年，台海局勢正處於一個微妙且危險的結構性轉型期。過去數十年維持和平的兩大支柱——外部的軍事威懾與內部的文化認同——正雙雙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。如果各方不能在 2026 至 2030 年這一關鍵窗口期找回現實主義的平衡，台海和平的「動態均衡」恐將難以為繼。

長期以來，台海局勢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部軍事威懾，即美國干預的預期。然而，物理規律與地緣現實正逐漸改變這一方程式。

首先是軍事重心的不可逆位移。隨著中國大陸區域拒止（A2/AD）能力的成熟，第一島鏈內的制海權邏輯已發生根本改變。東風系列反艦彈道導彈與高超音速武器的部署，使得外部航母編隊介入的成本與風險呈指數級增長。根據測算，一艘價值 133 億美元的福特級航母，在面對成本僅為其千分之一的飽和導彈攻擊時，其生存紅線已被大幅拉高。這種「成本非對稱性」意味著，傳統的外部威懾正在從「絕對保障」轉變為「高風險博弈」。

其次是物流與續戰能力的差距。大陸依託其龐大的工業產值與密集的陸路物流網（如超過 4.5 萬公里的高鐵網），擁有天然的「主場優勢」。相比之下，距離台海最近的美軍基地如關島（2700 公里）或夏威夷（8000 公里），在地理上處於極端劣勢。這種實力的物理位移，迫使外部力量的策略正從直接干預轉向「豪豬式」的消耗戰準備，而這對台灣而言，意味著和平紅利的枯竭。

然而，比軍事位移更令人不安的是內部支柱的侵蝕，即「認同盾牌」的失效。

筆者提出「認同盾牌假說」：當領土爭議的雙方共享同一種族、文化與歷史認同感時，這種「親緣感」會成為天然的減震器，限制武力使用的規模與烈度。在這種框架下，衝突被視為「家務事」，打擊行動會因顧及同胞情誼而極力避開民生基建與平民。

但數據揭示了一個嚴峻的趨勢。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觀察，台灣民眾「純粹台灣人」的身份認同已從 1992 年的 17.6% 飆升至目前的近 70%，而年輕一代更是高達 80% 以上。這種從「一家人」到「異族鄰國」的心理脫鉤，正在拆除和平的最後一道防火牆。

一旦北京認定和平統一的認同基礎已徹底消失，其戰略重心將從追求政治共識的「統一」轉向冷酷的「領土收復」。屆時，軍事打擊將不再受限於「同胞情誼」的道德枷鎖，針對能源、電力與通訊的飽和打擊將變得沒有任何顧忌。去中國化雖然換取了短期的政治動員，卻在無意中解除了對方動武時的情感約束，將台灣推向了極其危險的邊緣。

目前，台海局勢正陷入一種「平庸治理」的怪圈。全球範圍內，現代治理系統普遍傾向於獎勵提供即時情緒慰藉的領導者，而非具有戰略遠見的政治家。在台灣，這種表現為「避難所心態」：大眾傾向於相信現狀可以永久維持，拒絕面對認同斷裂帶來的地緣代價。而在美國，交易型外交邏輯的興起，使得安全承諾日益演變為一種「保費支付」的商業行為。

面對 2026 至 2030 年的關鍵窗口，我們面臨三種可能的軌跡：其一是「豪豬式」的長期摩擦，台灣在經濟枯萎中維持名義自治；其二是「玻璃盾牌」式的突然崩潰，在失去認同屏障與外部支持後發生意志雪崩；其三則是「現實主義的重置」。

所謂重置，即通過找回文化認同來重建「認同盾牌」。承認文化上的「中國人」身份，並不同於政治制度的趨同，而是以文化共識換取戰略緩衝空間。承認親緣關係，是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的避戰工具。這不僅能撤掉對方動武的道德階梯，也能為台灣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空間爭取數代人的時間。

歷史沒有永恆的現狀。當實力對比與認同根基雙雙發生鉅變時，和平需要通過理性的妥協而非感性的口號來重新錨定。對於 2026 年的台海而言，找回共同的文化底色，或許是通往未來和平最務實的一條路徑。

作者簡介：殷彤，美國奧本大學博士，洞見橋商業諮詢公司創始人，研究方向包括組織行為學、信任理論與人力資本戰略。